

主办：三亚学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编委会主任：俞可平

中国治理评论

陆 丹 / 主编

2019 年

第 1 期

总第 8 期

CHINA GOVERNANCE REVIEW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集刊名：中国治理评论

主办单位：三亚学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CHINA GOVERNANCE REVIEW

编辑委员会

主 任：俞可平

主 编：陆 丹

执行主编：杜振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王海明 三亚学院

包雅钧 北京大学

刘建军 复旦大学

米加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杜振吉 三亚学院

时和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

吴晓林 南开大学

吴理财 安徽大学

张小劲 清华大学

陆 丹 三亚学院

陈国权 浙江大学

周光辉 吉林大学

周红云 北京大学

俞可平 北京大学

袁方成 华中师范大学

姜晓萍 四川大学

黄卫平 深圳大学

景跃进 清华大学

褚松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编辑部成员：杜振吉 王致兵 杜 娟 伍志洁

英文翻译：刘建国 阮 曦

2019年第1期（总第8期）

集刊序列号：PIJ-2019-387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中国治理评论

GOVERNANCE REVIEW

2019年

第 1 期

总第 8 期

陆 丹 / 主编
杜振吉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卷首语

治理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2012年《中国治理评论》创刊之时，俞可平教授在《发刊词》中指出，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可以说，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对治理问题和治理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对我国治理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于科学定位和构建基于中国发展现实的治理理论及其思想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治理评论》自2012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刊发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受到学界尤其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19年5月，经俞可平教授提议，《中国治理评论》改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三亚学院共同主办，编辑部设于三亚学院，具体负责刊物的组稿、编辑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编委会成员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治理评论》2019年第1期（总第8期）即将面世。在此，谨向关心、关注和支持我们办刊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及作者和读者表示真挚的谢意。

《诗经·大雅》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应不断革故鼎新，开拓前进，与人类文明同步伐，与世界发展共进退。同时，胸怀家国，博施济众，心系苍生，关爱百姓，也是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治理评论》将继续遵循“关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强调全球视野和中国关怀，倡导问题意识，鼓励学术对话”的办刊理念，提倡着眼于中国实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努力使其成为该领域专家学者展示其思想智慧的公共空间和学术园地。在编委会全体同仁的精心谋划和关心、呵护下，

在广大学界同仁以及作者和读者的关注、支持下，我们有信心使《中国治理评论》越办越好，我们力图并有信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治理领域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思想碰撞平台和信息发布平台。

我们衷心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鼎力相助，不吝赐稿；衷心希望关注本刊的读者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希望经由《中国治理评论》这一学术平台，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治理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并在实践探索方面不断创新和进步。

陆 丹

2019年9月10日

目 录

特 稿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	俞可平 / 3
-----------------	---------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价值标准体系的哲学思考	王海明 / 13
中国社会治理逻辑转型：主体分化与多元共治	涂小雨 / 58
转型中国宪法治理模式下建设法治国家的思考	李 雷 / 67
国家行动何以温和而又有效？	柳亦博 / 81

治理理论与实践

超大规模政党的建党逻辑：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共同推进	汪仕凯 王冠亚 / 97
制度治党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与路径探讨	陈文权 王金炳 / 111
组织的内整合与党内治理 ——组织理论的分析向度	罗 峰 / 122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 ——基于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实践的分析	郝宇青 / 134

国外治理理论

包容性风险治理的概念及其在环境决策中的应用	〔德〕奥尔特温·雷恩 皮亚-乔汉娜·斯威泽 著 张力伟 李慧杰 译 / 149
-----------------------------	--

征稿启事	161
------------	-----

CONTENTS

FEA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Yu Keping* / 10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Value Standard System of National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Wang Haiming* / 57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 Differentiation and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Tu Xiaoyu* / 66

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ystem *Li Lei* / 79

How Can National Actions be Mild and Effective? *Liu Yibo* / 92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for a Supersize Party: The Joint Promo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Social Governance *Wang Shikai, Wang Guanya* / 109

The Role and Path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hen Wenquan, Wang Jinbing* / 120

The Inner Integra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Inner-part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Luo Feng* / 133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Jiangchuan Road Community Sub-district Office Practice i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Hao Yuqing* / 144

OVERSEAS GOVERNANCE THEORY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Risk Govern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Written by Ortven Renn, Pia-Johanna Schweizer;*
Translated by Zhang Liwei, Li Huijie / 160

CONTRIBUTIONS INVITED / 161

特稿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

俞可平*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在持续转型当中，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分歧和冲突，表明中国文化正处在转型之中，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化现代化问题、文化复兴问题、文化自觉问题、文化全球化问题的几场大的文化争论，就其时代背景而言，不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些文化讨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整个语境中，把它看成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形态上来说，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变奏中形成的中国文化，由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明要素组成，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三种要素的融合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成为主流文化。我们要在每种文化里找出适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素加以优化组合，要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种组合的新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

近年来，每到年末的圣诞节，网络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都会围绕要不要过洋节的问题产生尖锐分歧。很多曾经相互冲突的文化符号同时出现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如“男女平等”的观念和践行与“女德班”的举办等，不少人对

*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三亚学院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符号，采取了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很多，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价值观的冲突。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在持续转型当中，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党的十九大在原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四个自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自信”。那么，我们要自信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如果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是儒家文化还是佛家文化？所以，研究当代中国文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文化自信”，也关系到“文化认同”。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分歧和冲突，表明中国文化正处在转型之中，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

一 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大讨论

要准确把握和理解这种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文化，要正确理解现实生活中不断产生的这些分歧和冲突，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几场大的文化争论。

第一场是关于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的前奏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先导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本应该是哲学家们的事，怎么会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呢？这在外国人看来可能非常难以理解。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所以行动之前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并且，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争论就发生在文化领域。改革开放的过程，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上要求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文化上倡导自由平等和人的主体性。而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所以有人主张首先要实现文化现代化。

而要实现文化现代化，首先要批判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文化现代化事实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化的第一个反应。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都有大量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文章。学术界和文化领域也开始大量介绍、翻译和引进西方著作。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套丛书是《走向未来》，这套丛书的不少译者后来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但是紧接着，很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现代化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反对的声音就来了。

第二场是关于文化复兴问题的争论。当时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要改造，但是这种改造不是要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味地模仿或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要把文化转向的重点放在对传统

文化的弘扬上。所以，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地复兴传统，如中秋节、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大学里开始创办各种国学班等。第二场争论和第一场争论在时间上是前后连续的，其主要内容也都是关于文化转型的，但是第二场争论中的主流观点，是强调要把文化转型的重点放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而不是放在批判传统文化上，更不是放在学习西方文化上。

第三场是关于文化自觉问题的争论。批判传统也好，复兴传统也好，既然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需要应对全球化的一系列挑战，就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每一个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都应当有一个自觉的文化观念。文化自觉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他认为文化的现代化，不只是一要破旧立新，更是要推陈出新。一方面要超越传统，另一方面也要继承传统。文化自觉就是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下中国知识精英对文化的一种自我觉醒。对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观念，不仅知识分子接受了，官员和企业家也接受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大打文化牌，其实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第四场是关于文化全球化问题的争论。在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文化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文化观。一种是倡导文化的全球化。一些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展开，文化全球化也必将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化全球化不是简单的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和单一化，而是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共识、全球价值和全球意识。首先从价值层面来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正，这些过去我们没有的或比较淡漠的观念，现在也成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些观念作为核心价值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从日常生活层面看则更为明显，昨天纽约、巴黎的流行时尚，今天就会在北京、上海同样流行起来。特别是电影大片，几乎都是全球同时上映，这不就是文化全球化吗？所以有人说，我们倡导文化自觉，首先就是要树立一个全球意识、全球价值和全球文化的观念。

与文化全球化的文化观截然不同的，是文化本土化的观点。在中国的知识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始终伴随着反对意见——文化本土化。文化本土化或本土文化，就是凸显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对文化本土化论者来说，文化本土化就是文化民族化，文化自觉就是凸显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让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场大的文化争论和文化讨论，不仅发生在知识精英当中，也发生在政治精英当中，甚至发生在普通民众当中。人们常常为了某个观念、人物、事件而争得面红耳赤，乃至伤感情、伤和气，最极端的甚至会相互责骂。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在这些文化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二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奏

首先需要回顾和考察一下这些文化争论的时代背景。上述所有的文化争论不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离开了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个背景，就难以理解上述文化现象和文化争论。反之，抓住了这两个背景，就能够深刻地把握住这些文化现象和文化争论背后的实质。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些文化讨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整个语境中，把它看成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

（一）现代化与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文化讨论的基本任务，是发展与现代的政治经济生活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基本的着眼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与洋务运动以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达到高潮的文化讨论，有着相似的逻辑和相同的观点，并且共享许多基本的文化话语，如“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中体与西用”“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中国现代化经过了三个政治时代或者说政治制度，分别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现代化，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是现代化，就一定会有相同的逻辑在发生作用。现代化一定要有市场经济，一定要有民主法治，一定要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可以跟西方不一样，例如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法治，但首先要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治，所以现代化的逻辑依然发生作用。

（二）全球化与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挣不脱的背景是全球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文化讨论的着眼点是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关系，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则是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起一套与人类的普遍价值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讨论，有不同于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的逻辑和目标，它有一套过去所没有的新的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全球化与现代化放在一起就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盘根错节地呈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已经前卫到跟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人群一样，如丁克族、变性人、同性恋

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要重新发现和推崇古代传统，如举办“女德班”、倡导家族制等。

（三）双重变奏下的复杂文化格局

全球化与现代化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双重变奏。在这个双重变奏下，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以及人们对许多重要事情的看法和态度都会变得错综复杂。所以，当一些人在推动文化本土化时，另外一些人则在倡导文化全球化；当一些人在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时，另外一些人则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一些人还在为民族身份的失落忧心忡忡时，另外一些人则为全球认同摇旗呐喊；当一些人历数中国文化的种种落伍之处时，另外一些人则自豪地宣告 21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一百年以前，梁启超先生就向全世界宣告，20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的世纪。21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季羨林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再次高呼，21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实现，但是照样难度很大，因为文化转型不是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不是东方压倒西方或者西方压倒东方那么简单。

（四）中国现代化的两条主线

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化放到近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横贯历史背景下，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语境去加以解读，就会显得相当清晰和简明。首先看近代中国的两条主线，第一条是经济文化落后，中国要摆脱落后就要实现现代化；第二条是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和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化的两大基本任务，从根本上来说，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中国化与西方化的矛盾，都可以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这两条主线中得到解释。

第一，西化与中化、先进与落后。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下，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而中国传统则代表着落后，所以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先进思维和落后思维的交锋常常表现为西化与中化、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争。在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而保守反动的既得利益者则总是反对向西方学习。著名理论家艾思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落后势力总是通过强调“西方的文明如何没落”“如何不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传统文明如何优越”等论调，来反对中国的改革，反对中国向西方学习。

第二，学习西方与保持自主。近代中国的落后，一方面是自身落后于时代，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侵略造成的。所以，向西方学习时有一个立场和原则不能忘，就是要保持独立。一方面中华民族要独立，也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又要现代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这就造成一种现实的困境：

要实现现代化就得向西方学习，要独立又不能够靠西方太近，得保持距离。这个困境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脑袋里始终有两根弦，一根弦是向西方学习，另一根弦是一定要保持自主性。改革开放重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主张再向西方学习，但他同时特别强调要保持中国特色。中国当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艰难，中央最高决策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去，中国就会重新失去自主性，重新依附于列强。事实证明，中央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

第三，西化与反西化。改革开放使近代以后产生的“西化与中化”“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之争的语境再度形成：一方面，中国必须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主性。这一语境直接导致长期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被再度提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如何使中国不被“西化”？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官方的政治语境中，“西化”至今仍是政治上的一个贬义词。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能把向西方学习简单地理解成西化，但一旦这样的语境业已形成，很多争论就出现了。

第四，美国化与反美国化。西方的代表是美国，美国无论是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经济发展、军事实力上，还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上，无疑都是西方的标杆，所以西化与反西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与反美国化。一方面，从精英到普通百姓，许多中国人如果出国，首选一般是美国；另一方面，在中国，网络上骂美国是骂得最凶的，不少人恨不得美国在一天之内垮台。我们的“985”高校引进人才，优先考虑的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而美国的原版教材却不能进中国大学课堂，这不是明显矛盾吗？如果从改革开放的全球化 and 现代化背景、从中国现代化的两条主线去理解，这样的矛盾就能够得到解释。

三 正在形成中的新型中国文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人类逐步走进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也可能在全球化中受损。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必然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也必然使许多人再度产生对“西方化”特别是对“美国化”的焦虑。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

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自身的悖论，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悖论：既有人倡导“文化全球化”，又有人倡导“文化本土化”；既有人看重“文化的单一性”，又有人看重“文化的多样性”；既有人呼吁“文化的民族性”，又有人呼吁“文化的世界性”；既有人强调“民族认同”，又有人强调“全球认同”。

每一个关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上述语境。一些人更看重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全球性对于民族性的意义，他们往往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学习西方文明上。相反，另一些人则更看重独立对于发展、民族性对于全球性的意义，他们更强调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民族性。当这两部分人不能很好地相互沟通和理解时，就容易各自把对方和自己的观点推到极端。在前者看来，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和传统，而对于后者来说，前者的观点则过于激进和西化。

纵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所发生的转型与变迁，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首先，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

其次，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全新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在最大限度上包容了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极端观点。

最后，从形态上来说，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变奏中形成中的中国文化，由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明要素组成，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一样，当代的中国文化也由上述三家融合而成。

这就是笔者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所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解释并回应本文所列举的那些争论。无论是谁，都不要简单地在现实的文化争论中站队，不要把这三种文化相互对立起来。对于决策者而言，在制定政策时应当明白，不能以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这既做不到，也非常有害。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都应当自觉地朝着三种文化的和谐共存或融合的方向去努力。这三种要素的融合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成为主流文化。我们要在每种文化里找出适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素加以优化组合，要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种组合的新文化。